

郑观应与香港

王 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要] 郑氏一生过往香港 9 次, 驻埠不足 1 年。他在香港的活动可分成两类, 一是操持军务, 一是主办商务。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 他出色的军务乃是借助其在商务中建立起来的地缘、人脉与才干的优势成就的。香港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强侵略的舞台, 揭开了他从商、从军“两条腿”报国的人生新篇, 这令他引以为豪; 香港是郑氏蒙拘半年的“伤心”之地, 又令他刻骨铭心。本文认为, 香港蒙拘进一步陶冶了郑氏矢志救国的品格, 催生了《盛世危言》的撰写。就此意义上说, 香港“情结”, 促成了郑观应登上“三位一体”(从商、从军、立言) 报国成就的高峰。

[关键词] 郑观应 香港 蒙拘 “两条腿” 报国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10-0100-05

郑观应与香港, 乃是一个未见专题研究的课题。究其原因, 主要是资料零散, 不便搜集; 再者, 郑氏除 1885 年被拘禁于香港滞留时日稍长外, 其余总是来去匆匆, 活动过于隐蔽和单一, 史料难成“系统”。

郑观应一生高寿 80, 客居香港不足 1 年, 短暂的香港驻足却给郑氏一生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 弹丸之地的香港, 储存着郑氏实践“两条腿”报国的大步足音。郑观应与香港, 是一个很小的课题, 却浓缩着郑氏叱咤风云、迂回曲折的历史风韵。这又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旨趣在于, 寻觅郑氏在香港的足迹, 叙述郑氏一生与香港的过往; 勾勒郑氏香港蒙禁的前因后果, 厘清史实线索; 通过分析香港被拘禁事对郑氏人生思想的重大影响, 探索郑氏与香港关系的真谛及其深远涵意。

一、郑观应与香港的过往

粗溯郑观应一生的足迹, 他与香港过往不下 9 次, 时间跨越 25 年(从 43 岁至 67 岁), 停留的时间各有长短, 驻足的原因不尽相同, 对郑氏事业的影响大小兼有, 其活动的主脉可以归述为两类: 操持军务(第 1、2、3、4、8 次计 5 次) 和主办商务(第 5、6、7、9 次计 4 次), 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

首途香港是操持军务。1884 年春, 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之事业如日中天的郑观应, 为实践其为抗战战争效劳的心愿, 由与他“共事有年”的朋友王之春的推荐和本人自荐,^① 接受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差委, 到广东军营听差。郑氏此行踌躇满志, 表示: “官应赴粤后惟有黽勉从事, 静听指挥, 如稽察内奸, 招集民团等事, 知无不言, 为无不力, 联络邻好, 不敢畏难, 不敢避险, 不敢言劳, 以仰副培栽于彭帅, 即以酬王爷期许之盛心, 第使我武维扬, 海波不起, 则官应所默祷也。”^② 到粤后, 郑观应接手的第一份差事, 是到香港交涉提取驻德公使李凤苞从德国购回却被港英当局扣押的 25 尊大炮。据史料记载, 之所以选派郑氏前往斡旋, 乃因粤督张树声认定: “郑道官应通达交涉事宜, 于香港尤为熟悉”。^③ 第一次港行, 郑氏果然没有辜负上司的期望, 顺利提回被扣大炮。值得存疑的是, 透过“于香港尤为熟悉”等字眼分析, 郑氏此行似非第一次涉足香港, 如果是第一次赴港, 何来对香港“尤为熟悉”? 且此话出自粤督之函。经查有关史料, 有说 1883 年 12 月(农历十一月), 郑观应因对招商局的整顿颇著成效, 被派接替徐润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随即到南洋一带考察航运。此南洋之行, 是否涉足香港, 尚待考究。这里, 应该特别强

调，此次香港之行，是郑氏实践从军救国的第一步。从此，他开始了“两条腿”报国（一为经商富国，一为从军救国）的人生旅程。

郑观应第二次入港，与他接手的第二件差事有关。时值清军在越南战场败退，郑氏被委任赴南洋考察敌情，伺机联络南洋、西贡等地抗法人士，袭击法军的后备之区——“绝其储粮之区”，以期给法国殖民当局以致命一击。1884年6月12日，郑氏从香港乘轮启航。

南游归来，郑观应本将被派往琼州帮办防务，却因福建马江战役后，法军大举进攻台湾，台防吃紧，又受命办理援台事宜，他同样是欣然允命，态度积极。在致王之春书信中，郑观应表示：“入危险之地，既以身许国，无处不可。成败听天，惟尽我心无惭衾影而已”。^⑤于1884年8月赴港租船、购军械、运送粮饷，以支援台湾的抗法战争。这是第三次过港。

第四次客居香港最为不幸。1885年初，为筹办防务积极奔走的郑观应转道香港，准备往汕头、厦门察看海防形势时，却被太古轮船公司拘禁于香港。此事乃由买办杨桂轩亏欠太古巨款所引发：

1881年，郑观应脱离太古入轮船招商局时，与韦文圃、李秋坪等同保香山同乡杨桂轩接替其原任职务。此后两年，杨却“亏空太古洋行公款十万有奇”。^⑥身为保人的郑观应，自然脱不了干系，由于一些别有用心人士告密，太古公司于1885年1月在香港拘禁了郑观应，直至5月底，偿清全部款项才得以解脱。这是郑观应驻留香港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对其后来人生旅程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次。

香港被拘事件后，郑氏蛰居澳门五年养病立言，较少参与社会活动。至1892年6月，盛宣怀函邀其“商议轮船三公司和局一事”时，才再次出粤。二进轮船招商局，他致信盛宣怀表示：“辱蒙鲍叔知我，不弃瑕瑜，何敢自外，即当勉竭驽骀，图报知己”。^⑦在此之后，郑氏于9月16日和11月4日，两次过香港，并就建设招商局香港码头事作出斟酌和决断。是为第五、第六次过港。

1893年，郑观应之父郑文瑞辞世，郑氏守制完毕再次过香港，适在香港接到盛宣怀的函请，往验汕头等地码头建设事宜。此为第七次过港。

从1892年第二次进入轮船招商局始，此后的10年，郑氏虽积极从事各种活动，却并未脱离招商局这个大本营，直至1902年经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请，郑氏始准备离局赴桂听候差委。王之春在奏折中称赞郑氏“才具开展，熟悉洋务”。^⑧郑氏也没有让王之春失望，上任伊始便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亲赴香港、澳门、广州查缉私贩军械事，“曾雇侦探在香港查出货舱私储毛瑟枪五千杆，即报洋官起获、审讯，照例充公”；^⑨二是派人捕获会党首领；郑氏既为消弭地方隐患建树功德，又为其好友与上司赚足了颜面。这是第八次驻港经历。

第九次赴港时，郑观应已年届古稀。1909年，郑观应三进轮船招商局，为招商局在商部、邮传部办理注册立案手续奔劳，但并未能顺利办妥。1910年春，盛宣怀来函催促驻港的郑观应莅沪参加股东大会及办理注册事宜。盛宣怀称：“开会之期，可无我不能无公也”。^⑩这是过谦之辞，亦谓诚恳之意。

9次度港经历中（第4次除外），郑观应实践了参与抗击外国侵略的抱负，在操办军务中初显才华，从而揭开了他从商、从军“两条腿”救国的人生新篇章。此间举措，凸现了郑氏公而忘私、舍小就大的全局意识和报国不辞艰险的高尚爱国情操。在这里强调郑观应的军务与商务相关连，乃因郑氏在操办军务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在商务中建立的地缘基础、人脉关系及其经营才干的优势，在香港的“洋务”（军商兼与）活动十分出色，劳绩显著，致使郑观应与香港的关系注入了不同寻常的涵义。

二、香港蒙拘之经由

香港“情结”，对郑观应产生特殊影响的莫过于1885年的蒙拘事件。从事件发生伊始，直至晚年回首毕生，郑观应都念念不忘，颇具刻骨铭心之感。事情的前因后果，在郑观应的著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如下梗概。

1882年，经盛宣怀、李鸿章授意，由唐廷枢、徐润说项，郑观应脱离了曾效力8年的太古洋行转入轮船招商局。郑观应在太古的身份是总理兼管账房、栈房事，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年俸达七千两以上，另有数目不菲的额外分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的肥缺。郑氏在辞任前，保举香山同乡、也是太古买办的杨桂轩接任。与郑氏一起同为保人的还有韦文圃、李秋坪、郑廷江。

据郑氏表述，其离任时，太古“所存账房家具、栈房家具及司事欠项足抵帐上各友挂借之数，有盈无绌”。也就是说，杨氏接手时，太古的经营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出于对郑观应提携之恩的图报，杨桂轩曾“立约许每岁溢利提十之二酬谢官应”。但是两年后的情形却是“所获益利毫无分送”，而且杨桂轩“复私调公款与人合开茶栈及调款回家建造房屋，致亏空太古洋行公款十万有奇，贻累保人”。^⑩

“亏空”事发后，保人们难脱责任。结果是“除各人已赔外，尚欠四万余元”，^⑪太古洋行要郑观应照数赔足——按照西例：“同保者无力可赔，则尽向有力者取偿，否则例禁一年”。尽管郑观应表白：“夙昔办公峻洁，从弗营私，讵有余资代人尝债”。但太古仍未肯放过他。1885年初，当郑观应正在香港为援台抗法事务积极奔走时，却被太古洋行拘禁了起来，直至杨桂轩亏空之款被偿清为止，5月底才解禁。据郑氏自己称，这次被拘是受人陷害，缘于他在这次赴港购买军械、办理租船业务时，“所开价值悉照洋行原单，杜绝侵冒，不料竟以此招采办军械委员之忌，经手人候补道王某、奸商何某、洋人毕某，亦深怨余绝其弊囊，遂密告太古洋行”，^⑫遭致被拘。同时，这些人还散布流言，即使让郑观应代垫十万，郑也有能力支付，这更坚定了太古拘禁郑氏的决心。

关于被拘禁之原因，由太古追债所引发，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引人深思的是，郑氏披露了“租船”（物质利益）内幕中的人际矛盾，为诱发归因。是否还有其它隐因——其时经已饮誉商界的郑氏，此刻又在军务中初试锋芒，频频发力，是否有人暗藏“嫉妒”（政治利害），而借太古之刀向郑氏下手？此中奥秘，尚待释疑。

香港被拘，对郑氏人生是一次重创！用郑氏自己的评述曰，“数十年来名利尽丧”：

就“名”而言，“所当差事及闽督左中堂拟委署厦门道之谕，彭宫保与粤督所保军功劳绩，机会全失”。诚然，我们不能说当初郑观应离开获利颇

丰的轮船招商局而就委于彭玉麟手下，为抗法战争出力，图的就是争个功名。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经济生活已逾“小康”的郑观应来说，此等功名远比拿钱捐官荣耀得多、珍贵得多，这也是不争之实。

就“利”而论，为代借巨款，郑观应不得不在动用固有家产之外，还要求助亲友“集资万金”。最终“以太古各司事欠项及账房、栈房家具，太古昌各揽载行生意抵折外，尚赔银五千两。”^⑬

郑氏的“失利”，远不止此。郑观应被拘后，他当日所创设的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也“为卓国卿交太古洋行银四百元”，将郑观应的股份攫为己有，且“并不函告官应知之”，这无异于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而同为保人的李秋坪在将杨桂轩控告封产索还了代赔款后，李之妻仍向郑观应索要其转保的五千两之款。是故，郑氏又被逼付出这笔转保的款项。而当初说好待杨桂轩后人发迹，必还这笔代赔之款。20年后，杨氏之子虽已发达，却函复郑观应谓：“先君欠款颇多，且李秋坪欠款已被告官封产，赔偿不能再还。”^⑭弄得郑观应两头告罄。

香港蒙拘，直至郑氏去世，都未得公允解释。其对郑氏所造成的创伤，决非他人所能体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笔者在翻阅郑氏香港被拘前后《申报》所载相关资料中发现，类似杨桂轩亏空案件，即买办亏空洋行巨款之事，在当时的上海非常普遍。《申报》的“英界公堂琐案”、“会讯控案”、“会讯再纪”栏目中，记载了大量的相似事件。^⑮但只有太古采取了拘禁保人的措施。而就郑观应个人而言，他自认为对太古是有功的，事实上他也确实为太古作出了相当的建树，太古却不念旧情，恩将仇报，这使郑氏内心所受创伤尤其沉痛。

三、香港蒙拘之影响

郑观应在香港被拘几近半年，虽说未惊动朝野，^⑯却牵挂于亲朋坊间。事件发生后，“彭刚直公，方照轩军门，龚藹人方伯及上海各商均愿代偿”，知己朋友间的古道热肠或许给郑氏一些慰怀，但整个事件的打击，带给郑观应的内心创伤要比外部的慰怀大得多。再者，此时又被他曾任总办的上海织布局亏欠事件所扰，可谓祸不单行。

“内”“外”交困致使郑氏“抑塞愤懑，热血填

膺，致成肝疾……归里卧病三载，甫获就痊”。^①他在致盛宣怀的信中感叹谓：“年来命途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②其困窘境况，可窥一斑。

最负面的影响，“蒙拘”事件，对于正准备大展鸿图的郑观应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冷水浇背，他只能哀叹“觉来参彻浮生理，得失荣枯一任天。”^③个中不无一种怀才不遇的孤愤。确实，贫、病、困“交加”的郑观应消沉了相当一段时间，自称“少好道”^④的他开始沉醉于寻仙访道。游罢罗浮山，郑观应赋诗谓“少时梦想不能到，五十方快登陟缘。”^⑤不无一种因祸得福的自嘲。他还自遣谓“漫说千秋业，扁舟泛五湖。身心犹是幻，富贵亦何娱。听水知琴韵，观星展易图。醉来花下卧，黄鸟莫相呼。”^⑥于外人看来，他仿佛要怡情山水、栖身林泉了。

毕竟，郑观应是一位历经风雨、广见世面的智者，香港蒙拘使他遭受了暂时的心神折磨和财产损失，经过一段时间失望、彷徨与困惑的思想过渡，促使他反思世故，进一步感悟人生，“负面”影响而后之“收获”，可谓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不仅泽被当代，而且启示后人。下面暂且从三个方面去透析“蒙拘”对郑观应的“正面”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是郑氏把“创伤”内化为生活经验，成为郑氏训诫子侄，规劝好友的生动教材。他在致朋友的信中称“自惭眼拙时乘，所以一生辛苦，而依然故我，但世态炎凉，商场之利弊，自信无不尽知也。”^⑦并警示其道友，“当此竞争之世，人心奸诈，若为人谋，事来即理，不假思索以直待人，必为人所诳，动辄失败，为官为商，无不如是。官应曾经此苦，同志亦然。”^⑧他在训导子侄晚辈时，更是以身说教，谓：“予托足于官商两界，业经数十年，凡日中身所接，目所觐耳。所闻若辈之诈伪得失荣枯情形，无不毕绘于吾之前，情深感慨，故言之痛切耳。”^⑨一再叮咛“当此竞争之世，人心叵测，稍有不慎，即堕人机陷中。勿贪意外之财，无故而重言甘、礼下于我者，将有所求。凡往来银钱账目，无论亲疏，必须即时交代清楚，索还笔据，不可含糊拖沓，留为后患。”^⑩甚至不忘在遗嘱中将此事引以为训，诫子孙勿“因好义而受戚友

欺骗”，商场“人情险诈，银钱交易尤宜谨慎”。^⑪

最显著的影响，是郑氏将心伤逐渐抚平后，转而决志立言医治国伤。毕竟，寻仙访道绝不是郑氏的真实意图，只不过是“班生不遂封侯愿，要学钟离事炼形”而已。^⑫他蛰居澳门郑家大屋五年，完成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的写作，体现了郑氏思想的重大转折，铸成了郑氏毕生最光辉的思想成就。立说探索救国道路，郑氏从19世纪60年代便开始尝试。对洋人在中国境内的无理取闹、横行霸道，他曾慨叹“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者如彼，天下有此理乎！”^⑬呼吁志士仁人奋臂救国，重振中华民族的尊严。如果说郑氏1873年出版的《救时揭要》是其“立言”救国的感性认知探索，那么，《盛世危言》则是其“立言”救国探索的系统化纲领。盛宣怀赞誉《盛世危言》“启悟”臣工，“以醒耳目”，“如能因此一开眼界……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张之洞称道是书“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为良药之方”。《盛世危言》不仅对光绪皇帝启迪不少，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近世中国几代伟人……。

最长远的影响，是郑氏不仅从商伤中彻底解脱出来，并未离商、弃商，而且始商、终商，表现了郑氏忍辱负重、矢志“商战”的从业品格。在郑观应看来，“商战”就是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十类洋货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其“商战”的思辩非常明晰，就是要兴商抵御欺凌，以扬国威。郑氏正是秉此振商以兴国的理念，置个人事业、名誉损失于度外，一如既往与“商战”共始终，与救国共始终，这是近代弥足珍视的精神财富和爱国品格！郑观应为此树立了榜样，赢得了后世的景仰。

四、香港情结之揭示

审视郑观应与香港“情结”，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之揭示：（一）香港为郑观应开辟了“两条腿”救国的道路；（二）香港促成了郑观应登上“三位一体”报国成就的高峰；（三）香港塑造了郑观应矢志事业的奋斗精神；（四）香港内化了郑观应与与时俱进的特质品格。

谓香港为郑观应开辟了“两条腿”救国的道

路，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从军（抗击列强侵略），从商（通过商战救国）的两条腿，因为郑观应逐抗法之愿是从香港开步的。一层是言与行俱两条腿，郑观应不仅言商，而且从商，且务商很出众。

谓香港促成了郑观应登上“三位一体”报国成就的高峰，乃指郑氏从商、从军、立言，“多角色”报国，可谓是同俦的佼佼者。19世纪下半期，一批探求救国救民的先驱者，不仅认识到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民主和专制的矛盾，而且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方策。这里强调的是，郑氏不仅身兼多种角色，而且能在“前沿”、“浪尖”中建功立业，其报国实践的成就与风采，委实令同仁难以望其项背。

谓香港塑铸了郑观应矢志事业的奋斗精神，也有两层涵义。一曰郑氏矢志“商战”，百折不挠，能置名誉利害于度外；二曰郑氏“立言”，香港蒙拘，促成香港励志，进而促成郑氏抱病（准确表述应是贫、病、困）撰述《盛世危言》，锲而不舍，可谓是用心血铸学问，用生命谱惊世巨著，这种精神，于今仍然振聋发聩，催人落泪。

谓香港内化了郑观应与时俱进的特质品格，乃在于强调香港蒙拘后的郑观应，思想不但没有因此沉迷、颓废，反而不断适时跟进，用志开新。这是近代以降无数先驱者的特有品格，对于今人，不失为一种鞭策。

① 《彭刚直公密筹暗结暹罗袭取西贡密折》中云：“郑官应恰有信来，求为奏调，由沪回粤，亲赴暹罗、西贡、新嘉坡等处，密约布置，机有可乘”。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515页。

② 《稟醇亲王为报效德律风电机呈并仿照泰西英法俄美德创设水陆军学堂章程》，《郑观应集》（下），第436页。

③ 《稟粤督张振帅札委赴港提回购炮事》，《郑观应集》（下），第441页。

④ 《致雷琼道王爵奏观察论开垦兼承办铜绿矿书》，《郑观应集》（下），第500页。

⑤⑩⑪⑭ 《致广肇公所董事书》，《郑观应集》（下），第1210、1210、1210、1211页。

⑥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⑦ 《桂抚王爵帅奏西省军务需材请调郑道等佐理折》，《郑观应集》（下），第1523页。

⑧ 《稟粤督岑大帅论查缉私运军械并代粤商公举梧州三江缉捕统领》，《郑观应集》（下），第466页。

⑨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致郑陶斋》，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⑫ 《〈海行日记〉序》，《郑观应集》（下），第1172页。

⑬ 《辛酉年春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书》，《郑观应集》（下），第950页。

⑮ 参见《申报》（影印本）第26、27册（1885年1—12月）。

⑯ 郑观应香港蒙拘，未见太古洋行所在地的大报《申报》作过报道（笔者苦于无法查找香港《华字日报》核实）。《申报》仅于1885年2月26日报道杨桂轩“到案后即患病逝世”的短讯。按此推断，郑氏被拘禁，乃属平常，并未引起社会关注。

⑰ 《〈海行日记〉序》，《郑观应集》（下），第1172页。

⑱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月十三日。

⑲ 《五十自述》，《郑观应集》（下）1290页。

⑳ 《〈道法纪纲〉序》，《郑观应集》（下），第60页。

㉑ 《游罗浮》，《郑观应集》（下），第1273页。

㉒ 《自遣》，《郑观应集》（下），第1272页。

㉓ 《致许君奏云书》，《郑观应集》（下）940页。

㉔ 《再致扬州修道院同学诸道长书》，《郑观应集》（下），第116页。

㉕ 《训次儿润潮书》，《郑观应集》（下），第1210页。

㉖ 《训子侄》，《郑观应集》（下），第212页。

㉗ 《中华民国三年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郑观应集》（下），第1484页。

㉘ 《早秋病居感怀》，《郑观应集》（下），第1273页。

㉙ 《交涉》，《郑观应集》（上），第184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